

●高成鸢

中国索引史的新发现及索引本质的表述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Qianlong's rule (1736--1795)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Fenlei Bei Jian" (classification) in a book known as "Ru Fan" written by Li Yuan is a pure index, the technology of which has already come up to the standard of the modern times. Its principle of compilation is just what the scholar Zhang Xuecheng has interpreted the essence of index, i. e. "interdependence". 7 refs.

SUBJECT TERMS "Ru Fan"--Studies History of Index--China

CLASS NUMBER G257.5-09

1 “一书附引”为现代索引本原

索引象分类一样为图书馆学的基本范畴,其历史发展的比较考察是目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现代目录学家姚名达在其名著《中国目录学史》的“结论篇”中总结说:“我国目录学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后来随着学科研究的进展,一些学者不同意姚氏关于中国无索引的断言,并在传统目录学范围内做了关于索引存在的不少考证,例如治湾学者蔡武的《汉学索引发展史简编》^[1]。《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卷》(以下简称《大百科》)在“索引(index)”条目的“简史”小节中曾做扼要总结,在列举“早期索引”时提及唐人《元和姓纂》等“姓名索引”,及宋人徐锴《说文韵谱》、明人傅山《两汉书姓名韵》等“专书索引”。这里以“姓名索引”与“专书索引”并列,逻辑上似嫌混乱。体味释文本意,在于说“早期索引”只是索引的萌芽或不完备形态。因此才无固定类名,否则就无须到现代才引入 index,并终于采用借自日本的

“索引”译称。

那么中国早期索引的不完备表现在哪里?以《元和姓纂》为例,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郑樵著《氏族略》,全祖其文,盖亦服其赅博也”^[2],可见乃是一部姓氏专著,不过以唐韵为序加以排列,而非纯粹如《大百科》的“索引”定义所做的“检索工具”的界定。它与首先被举为“古代索引起源之一”的类书《皇览》相比,虽有检索功能的明显进步,却并无本质差别。

蔡武先生的专论有一节题为“明代的索引——傅山的人名韵”,与“中国早期的索引”一节并列,表明认为傅山的《两汉书姓名韵》已进步为真正的索引。诚然此书已不再是传记资料的排列,尤为重要的是其中首创“又见”、“互见”等索引手段。然而严格考察,虽然它指示原书章节的功用已较突出,但仍不够纯粹,而依然具有人物小传性质,例如《东汉书姓名韵》“戴凭”项下有简介长达150余字^[3]。

《大百科》的释文提到“专书索引”(傅山之书即为举例之一),但没有提出“群书索引”

与之对应。蔡武先生在其专著之“索引的种类”一节说:“书籍索引(引者按,此系与报刊索引相对而言)可分单书索引和群书索引。单书索引以一书为检索对象,多附于单书,同时出版。”考察人类图书事业发展史,报刊的产生远在图书之后。那么单书索引和群书索引何者产生在先呢?《大百科》首先举出的是中世纪的《圣经》语词索引,继而作为“早期较著名的索引”举出15世纪德国A·奥古斯丁纳斯的《布道的艺术》一书的主题索引,再次是迟至1830年的德国文摘刊物《药学总览》索引(期刊索引性质属群书)。这清楚表明在索引发达较早的西方,专书的索引产生于群书索引之前。

仅为一书编制的索引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后人为广泛流通的经典之书编写的,另一种是即由原书编著者或出版者编写的。后者符合蔡文所谓“附于单书,同时出版”的界定;前者当然无法与原书同时出版,但最终不免附于原书刊行。这里所谓“原书”,在蔡文和《大百科》释文中有不同称呼,分别为“单书”和“专书”。我们玩味其细微差别,不妨派以分工,即以“专书索引”特指后人为一部经典所编索引,“单书索引”特指附于一书同时出版的索引,本文姑且简称为“一书附引”。

从西方索引史来看,《圣经》语词索引显然是“专书索引”,《布道的艺术》索引则是“一书附引”,尽管前者早于后者,但这不过是一个特例。很快普及而成为主流的是“一书附引”。19世纪英国已流行一书附引必不可少的看法,国会议员甘贝尔(John·Campbell)甚至提出法案规定新版图书必须附编索引,否则不予版权登记并处以罚金。此案虽未通过,却推动了一书附引的普及,后来连回忆录等一般读物也附有索引,例如笔者手头一部庄士敦(庄氏为溥仪的老师)著《紫禁城的黄昏》(R·F·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附有两个索引(Index of Named & General Index)。由于传统背景的

不同,一书附引在中国很难普及,一般读物中只见过溥仪《我的前半生》初版时附有,可能受老师影响,读者称便,但其后各版都被删除。1848年问世的美国《普尔期刊文献索引》(据《大百科》)为多种期刊论文索引,性质属于“群书索引”,工程庞大,只能是索引事业不断发展的产物。根据事物发展由简到繁的规律,索引的最简单形式必然溯至单书,所以可以说“一书附引”是现代索引的本原。

中国早期索引史上同样是专书索引在先。《大百科》释文例举的第一部“专书索引”、宋人徐锴的《说文韵谱》是专为汉代《说文解字》而编的。此书是对排列原则不明晰的原书加以重组,是带有索引功能的专书。迟至现代,胡适还说如能为《说文解字》加一个检字索引,象《史姓韵编》之于一部二十四史,可以节省多少精力^[5]。此时黎元椿编的《说文通检》早在光绪五年(1879年)已出,而胡氏不知,可见在中国专书索引的发展后来反而迟于以《史姓韵编》(乾隆四十八年,即1783年)为代表的群书索引。在这样的背景下,“附于单书同时出版”的索引很难产生,至今未见发现实例的报道,也就不奇怪了。

2 《蠅范》“附“备检”:中国索引的范本

《大百科》“索引”条目说:“中国古代的索引又称通检、备检、韵编……等”,但对这些名目都没有举出例书。据前人考察,称“韵编”者以清人汪祖辉《史姓韵编》为最早,此书是在章学诚索引理论的直接指导下编成的,较为典型完备,但它以二十四史的人名为对象,属于群书索引;称“通检”的以黎元椿《说文通检》为最早,30年代中法汉学研究所编印《尚书通检》等十种,使这一名称为人熟悉,但这些通检像哈佛燕京学社的一批“引得”一样都是作为古书的索引专书行世,附有原文的,其原文也反处从属地位。

“备检”之称最早曾见于宋晁公武《郡斋

读书志后志》的“群书备检”,但其书久佚,内容性质不明。1935年又有金陵大学《丛书子目备检》,此外“备检”名称未见流行,可能因为“通检”之名更合于古籍索引专书大流行的实际,相比而言,顾名思义,“备检”似意味着较少“通”用,因而适于作“一书附引”的专称。

近年笔者因承担文化史课题研究而广涉子部杂著,发现《蠕范》一书,于“总目”以外另附“分类备检”于书前,经研究初步认定为中国古代“一书附引”的标本,非常值得注意。

《蠕范》八卷,清乾隆时代李元撰,可见《湖北丛书》本刻于光绪辛卯年(1891),曾收入《丛书集成初编》。此书为内容丰富的动物学专著,体例十分独特。全书对繁多的物种逐一介绍,但与一般类书不同,主体部分不着眼于每一物种,而对整个动物界的纷繁现象按观察者的理性认识作多方面的归纳。特定的归纳主题有十六个,构成本书的《总目》即目录。依次为物理(对动物的形而上认识)、物匹(性生活)、物生(繁生)、物化(变异)、物体(结构)、物声(鸣叫)、物居、物性、物质(生态关系)、物材(利用)、物知(本能)、物候、物名、物寿。以上共为八卷,每卷二篇,每篇一二十章。这些主题实质是动物学研究的“范畴”(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范畴”条目:“各门具体学科都有自己的范畴体系。”)显然作者将此书题名为《蠕范》,即取“动物学范畴”之意。

以上主体部分文字极简括,所占篇幅不多。更多篇幅用于对425种动物的分别介绍,与一般类书无别。这些详论都分散附存于主体内容之间,以版式的安排(每行上方缩格)为别。例如第一篇《物理》中有一章,正文曰:“飞虫贤蜂,走虫贤蚁,倮虫贤蚕。”其后附有蜂、蚁、蚕的三节详细介绍,各数百字,按上低一字的格式排行。

这种结构安排,会使本书所含一般动物学记述的大量内容因缺乏目录而难以查考。显然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特别设计了

题为《蠕范分类备检》的主题标引系统,安排在“总目”之后,正文之前。“备检”中按为人熟悉的传统动物分类体系将425种动物分为禽、兽、鳞、介、虫五大类,每类之下再分小类,如“兽属”下又分猫、羊、豕等属。在每种动物的名下附一小字,都是“总目”中十六篇篇名的简称,以指示这种动物的详述被安排在全书的哪卷哪篇。例如读者想查“虎”,就可以根据分类常识从“分类备检”的兽类猫属中找到“虎”项,见到“虎”字下有小字“理”,就知道按指示到卷一的第一章“物理”中去找。此篇有一章正文曰:“虎为山君,羊跪母而乳……兽有五伦也。”其后附有虎的详细介绍。

《蠕范》的“分类备检”可以认定为纯粹的索引,理由是它具备索引的要素,同时不掺杂非要素的成分。据来新夏主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索引“一般由标目、修饰语、参照项构成”,按“修饰语”只用于详备的索引专书,简单的索引如“一书附引”,只有标目和参照项。在上述举例中,“虎”为标目,下附“理”字即指引“地址”(来氏辞典用语)的参照项。

现代索引的参照项可以指明页数,但中国古籍一般没有“大排行”页数,参照项只能列出篇名或其代码。篇名有直观之便,但也有不够简洁之弊。叶圣陶创编《十三经索引》时设计出以简称代篇名的做法,如以“诗”、“左”代《诗经》、《左传》。《蠕范》以“理”、“食”代《物理》、《物食》等篇名,其法与《十三经索引》全同,表明其索引技术已达到现代水平。唯一不足在于未能像章学诚所设想的那样“自一见再见……皆详注之”^[6],而限于指示集中论述的一节。这也是与《蠕范》一书的结构相适应的。

《蠕范》著者李元生平只留下简略记载。据其原籍方志湖北《京山县志》所录传记,他于乾隆辛卯年(1771)“举于乡”,乙未年(1775)“大挑一等”(补选进士),历任四川仁寿等县知县,嘉庆丙子年(1816)乞病归。按章

学诚生于乾隆三年(1738),假定李元20岁中举,则其年龄只小于章氏十几岁,可视为同时代人。章氏著作,包括阐述索引理论的《校讎通义》,都迟于死后31年(1832)才得到刊行,而包括《蠕范》的李元《浑斋七种》,据其传记,刻于著者在蜀任官之时,可以推知早于章书约90年。由此可以断言,李元与章学诚分别在实践和理论上重要开创,同为索引事业的前驱。进一步说,在中国尤为欠缺的“一书附引”方面,李元的《蠕范》更是超前的独创,其时间甚至与《大百科》所举的西方《布道的艺术》比较,相差也不过百年。所以这在世界索引史上也是值得重视的。

据李元小传,他“著述极富”,包括《蜀水经》及“河洛太极之学”,“流播都门,一时通儒多重其说”,又著有算书,被数学家李潢评为“博大精深”,可见是一位具有科学头脑和创造精神的人物。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有《声韵谱》等音韵学专著。人所共知,清乾嘉年间的音韵学研究其分析方法与西方科学极为接近,况且书名中的“韵谱”还曾作为索引的类称。李元编纂的《仁寿县志》“体裁极为严谨”。这都表明,他具有创造索引新体裁的科学素养。《蠕范》备检在当时的出现,关联着科学发展的特定背景,决不是偶然的。

3 “相为经纬”:章学诚对索引本质的表述

《蠕范》书名取“范畴”之义。范畴category象index一样为外来语,译名取自《尚书》的“洪范九畴”。《辞海》说人们把范畴“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不同方面进行分析归类而得出的基本概念”,即与分类密切相关。《蠕范》的简练正文是从总论角度将动物的共性按16个方面分类归纳,这些方面被列为此书的“总目”即目录。可见它的目录基础于分类。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同书的主要篇幅为四百余种动物的分论,它们全靠“备检”反映,所以备检也明显具有目录功用。繁多的动物名

称不能随意排列,书中分为三个层次,形成逻辑体系,故称“分类备检”。可见“备检”即索引更直接地基础于分类,目录、索引本质相同。

目录与索引的无别,在西方索引史上也明显存在。从古罗马哲学家西赛罗到莎士比亚,都把Index排在一书之前,作“目录”用。至今一册书前边的“目录”多作Contents,此词的本义为“内容”,本来不必有指示各篇章“地址”的功用。这与中国古籍情况相似,例如《孟子》五篇,其“目录”(此处与contents对应)并不规定顺序。事实上篇章顺序在流传中多有颠倒,例如《老子》的“道经”、“德经”从出土帛书发现古今倒置。西方contents久已附带页数,那么它与index的分工,显然是由于读者对指示“地址”的要求更为突出的结果。

在一本书中,目录与索引的功用明显不同,这掩盖了我们对二者之本质的认识。1848年出现的《普尔期刊文献索引》就是篇目的分类索引。今天一种期刊的年度分类索引,即称“总目录”。放大到一个图书馆的规模来看,则更为明显:一套分类目录(catalog),实质上也是一套分类索引。或说得更清楚些,一套书名目录,对于作为本体的分类目录而言,乃是它的索引。索引和目录既然都有揭示内容和指示地址的功能,就可以说两者没有区别。考察比较多种图书馆学工具书,可以发现,其“目录”的定义与“索引”的定义虽有不同,但都未能严格排他性地不能互换使用。

就本文而言,我们考察了各家给出的“索引”定义,各不相同,难以判定何者更为精当。这可能与索引本质的不易认识有关。让我们以用语较简略的旧《辞海》的“索引”定义为例:“将书籍中内容要项或重要名词逐一摘出、依次排列,标明页数以便检索者,谓之索引,亦称引得”。这一定义能符合不与“目录”定义换用的要求,然而它的问题在于概括性不足,即特指一书索引,而不能适用于期刊索引之类。如果从西方索引发展早期的“一书附引”出发,则这一定义的精确之处在于“逐一

摘出”一语,诚然这排斥了与“目录”定义换用的可能,但又带来新的矛盾,即真正的早期索引,如《蠕范备检》,恰恰又不能具备“逐一摘出”的复杂性能。

定义的表述必须概括诸多方面,因而其用语难以简短。定义的核心是对事物本质特点的认识,而本质往往可以一语道破。考察中国索引理论创始者章学诚的有关论述,令人惊喜地发现了他对索引本质的一针见血的表述。这就是他曾反复阐明的“互相经纬”(“相为经纬”)的原理。这一提法最早见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章氏建议其族人编制索引的书信中。他说“曾令人将明史列传人名编韵为书”,原想“取诸篇人名重复互见者,编注其下”,“后以为工稍繁,先将列传所著人名,编为一卷,今录本呈览”。章氏接着建议对方“如治年表之暇,再能将二十二史列传人名,亦仿此例编之,可与年表互相经纬”^[7]。

这里章氏所谓“互相经纬”,是与其族人正在编制的《二十二史年表》相对而言的。年表以时间为顺序,是为经;人物“韵编”以音韵为顺序,是为纬。反之,如果视音韵顺序为经,则时间顺序为纬,故称“互相经纬”。此信下文又说“今得足下为之经纬条理”,是以“经纬”为动词,表示索引的编制方法。“条理”表明经、纬两角度都是固有条理的,这正是索引的特点。

在章氏的目录学探索中,他的“互相经纬”的构想继续成熟,13年后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又提出编制体例完备的分类索引的设计,他称之为“别录”。其对象包括纪传体、编年史籍,将其中资料重新加以分类编排,而于各类之下注明篇目。他描述这种索引的编制技术说,对于纪传史书,“必将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于纪、表、志、传与事(目)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于下”,构成“别录”“冠于全书之首”。对于编年史书,则“著其……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此外,对诏诰、

章奏、书牋等文献也要“摘取篇名,别为凡目,自成一类,殿于诸类之后”。对于“别录”即索引的这些复杂内容,章学诚有明快的表述:“提纲挈领,次于整理本书目录之后……使与本书目录相为经纬”。

这里的“相为经纬”明白揭示:如果以目录为经,则索引为纬;换言之,如果把索引当作目录,那么目录也可以成为索引。这就是对于索引本质的最为透彻与精当的表述。用今天的语言来说,索引与目录的关系可以称为同质而互生的关系。经与纬的质同为线索,它们的差异依赖于互相对应而存在。在目录的概念已为人熟知之后,要给索引以精当定义,确有困难,所以章学诚对于索引本质的表述,较定义更为切要而适用。

对于章学诚“互为经纬”的索引理论,与章并肩的索引实践者很早就提供了纯正的标本,即《蠕范》的“备检”,它与同书的“总目”互为经纬:如果以备检(索引)为目录,则其“总目”即为索引。备检与总目的关系,象一切学科的概论一样,是垂直交叉的关系。

总之,一切领域、各种事物的因素及其关系都是复杂的,除经纬的垂直交叉外,它们更由无数角度的线索交织而成。在考察这些复杂关系时,可能遇有从任何角度出发的需要。因此随着科学认识的发达,索引事业也不断进步,产生了各种类型的索引,如《大百科》所列举的著者索引、题名索引、语句索引、主题索引、分类索引等。这些索引在一定场合下又可称为目录(包括与中文“目录”对应的 **contents** 和 **catalog**),如分类目录、书名目录等。

索引分类还可以是三维的即多层次的,包括图书馆的“总目录”,期刊的全年篇目索引,直至一部典籍的词语索引 **concordance**,其中 **concordance** 最能反映繁多的检索角度。

电脑在具有庞大容量的同时也具有繁多的索引角度。就本文主题而(下转第76页)

最基本的动因。不同效用档次的信息商品其经济效益的大小也不同。一般来说,效用档次越高的信息商品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越大,所以该信息的价格定得就越高;反之则价格就低。

(4) 期得新增利润。期得新增利润关系到买卖双方的利益。期得新增利润的高低决定着议价的幅度范围,并进而直接影响信息商品的定价。

(5) 独占性。对于专利等类型的信息商品,因买方可保护自己的市场免受侵占,从而剥夺了卖方在该区域再向其他求购者出售该项信息的权力。卖方应将总成本一次性计价,而且还可以适当提高价码^[2]。

4.2 环境因素

(1) 供求关系。供求关系对信息商品价格的制约作用可视作是物质商品价值规律对信息商品进行调节的结果。由于信息商品是一种特殊商品,价值规律对它所起的调节作用只能是间接地传递过来的。如市场上某种物质商品紧俏,则与这类商品相关的信息也就会成为紧俏商品,其价格会随物质商品的上扬而上扬。

(2) 政策因素。由于当前信息市场的不完善,政府对信息产业的干预将直接影响信息商品的价格。我国已将信息业列入第三产

业要求重点发展,并着力提高大众的信息意识,这些无疑将导致信息商品的普遍升值。

(3) 心理因素。信息交易的成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买方对信息商品的认知能力、认知程度和心理承受力。这些心理因素虽不直接体现在价格中,但无疑对信息商品的定价有着潜在影响。

(4) 买方的支付方式。信息交易中,支付方式关系到双方的风险责任和实施中承担义务的大小。它也是影响信息商品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买方一次性付款应比分期、提成支付价格要偏低些。

参考文献

- 1 卢根鑫等. 国际贸易导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56
- 2 谢阳群. 专利商品的价格及其定价方法初探. 情报业务研究, 1994, (4):119~123

林平忠 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信息管理系副教授,《文献工作研究》副主编,出版专著2部,发表论文多篇。通讯地址:上海市江湾五角场,邮编200433。

张建松 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信息管理系学生。通讯地址:同上。

(来稿时间:1996—02—07。编发者:翟凤岐。)

(上接第93页) 言,电脑的惊人之处在于具有即时自动编制索引的功能。然而它的编制原理仍然不出章学诚的对索引的本质表述——互为经纬。

尽管中国索引的发展相对落后,但也有李元的实践和章学诚的理论值得称道,后者还是令人骄傲的遗产。

参考文献

- 1 蔡武. 汉学索引发展史简编. 人与社会, 1973, (3); 见:索引编制法论丛, 台湾天一出版社, 1979

- 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卷二十七, 子部. 类书类。
- 3 傅山. 东汉书姓名韵. 山西书局铅印本, 1936:37
- 4 王振鹤. 谈索引. 见:索引编制法论丛. 台湾天一出版社, 1979:39
- 5 胡适.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国学季刊, 1923, (1)
- 6 章学诚. 校雠通义. 商务印书馆, 1936
- 7 章学诚. 章氏遗书, 卷九. 吴兴嘉业堂民国刻本

高成鸢 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地址:天津市复康路15号。邮编:300191。

(来稿时间:1996—03—25。编发者:刘喜中。)